

从档案看1924年的江浙战争

陈长河 殷 华

—

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，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各派军阀间的关系已很清楚，英、美等国支持直系军阀，而皖、奉两系军阀的后台则为日本。日本除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外，又扶助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，以对抗在英、美势力控制下的江苏直系军阀齐燮元。张作霖也支持卢永祥反对齐燮元，以争夺江浙这一富庶之区。

江苏属齐燮元的地盘，而上海却为卢永祥所控制。上海系财富之区，又当水陆交通要冲。在1920年直皖战争及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，齐、卢之间曾为争夺上海不断发生冲突。只因直系军阀在南方的势力尚未完全稳定，及上海总商会等团体主张维持上海和平，卢永祥与齐燮元才勉强表示愿“保境安民”、“维持和平”。应各界之请，“江浙和平公约”于1923年8月间，先后经苏方齐燮元、韩国钧与浙方卢永祥、张载阳、何丰林及绅商高云麟、吴庆坻等签字生效。10月8日，卢永祥又与安徽督军马联甲仿江浙先例，公布了“皖浙和平公约”。但直系军阀、福建督理孙传芳却反对效法前者而签订“闽浙和平公约”。次年1月底，齐、卢等因北京公使团有派舰队来苏、浙二省“保护”外侨的要求，又允绅商各界之请，发表和平声明书。其措词冠冕堂皇，实则系表面文章。当时即有人指出，此举并非出于真心实意，而是仅作为缓冲之计，藉以“稍安江浙人心而已”。

当时张作霖为了孤立和打击直系，与卢永祥议定，政治上互相呼应，军事上攻守同盟。南方孙中山也想利用军阀各派系间的矛盾，以达到革命目的，遂与张作霖、段祺瑞（含卢永祥）建立较为松散的反直“三角同盟”，最终打倒曹锟、吴佩孚。为此，三方信使频繁往返，反复磋商。早在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之时，他们就夹击直系的军事行动达成秘密协议。1923年年初，反直三角同盟已基本形成。孙中山于是年2月23日告东方通讯社记者称，他与张、段间的三角同盟，“现正进行，甚顺利”。同年6月底，卢永祥通电反对直系首领曹锟贿选总统时，奉张、西南代表即集中于杭州，使沪、杭一带顿时成为反直活动中心。及至1924年齐卢战争爆发前夕，卢永祥电促孙中山克日出师，牵制直军。又派其子卢小嘉赴奉天，要求张作霖资助军费并移兵关外，遥为声援。

对待卢永祥的态度，起初直系内部并不一致。吴佩孚颇“主联浙”，为我所用，而齐燮元则“主先内后外，武力解决”^①，拔去眼中钉。曹锟也主张“先礼后兵”，并派鲍贵卿赴浙进行“疏通”。1924年1月，齐燮元举荐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，以便让他“派兵侵浙”，但吴佩孚“不赞成此策，政府亦踌躇”，其后吴派人赴浙劝卢“归顺”直系而不得要领，才声明此后“不再过问浙事”^②。齐为此于2月间致呈曹锟对吴有所不满，声称吴对其图浙计划“有所讥评，实未悉真相。假若吴使处燮元地位，恐张皇为尤甚矣”^③。此外，齐尚多次建议以赣、闽二省压卢撤出上海，也未被吴所接受。故当时有所谓“洛阳（指吴）反对攻浙”之说。

与此同时，江浙地区要求制止战争、维持和平的呼声，也甚高涨。2月，江浙等省绅商以江浙形势日见紧张，深恐双方兵戎相见，扰及地方，特派代表在上海集议，吁请浙、苏、闽三省同时撤防，以缓和战争气氛。之后，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、上海商会会长盛竹书和前山东省长屈映光等，也先后赴沪赴杭，意欲促进江浙和平运动。另内阁总理孙宝琦也曾通电发起和平大会，特邀卢永祥派人参加。显然，他们希望通过努力，能阻止战争或延缓战争的爆发。但后来事实说明，这些努力，均归无效。

江浙战机是从福建问题引发的。原来，1924年4、5月间，北京政府一面为进图广东，一面为酬奖周荫人入闽战功，乃任周为福建军务督理以代孙传芳，而任孙为闽粤边防督办以窥粤。但是，广东事实上外力不易打入，而一山不容二虎，福建一省也难容孙、周两军阀势力同时并存。为此，孙传芳便亟谋向浙江扩展势力，开辟新地盘，创造新局面。而原被周荫人自闽境驱出的臧致平、杨化昭两部经赣入浙，在段祺瑞指使下，于6月中旬为卢永祥所收纳，并改编为浙江边防军，拥有一万余兵力，以臧为边防训练处处长，杨为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，分驻于闽浙皖赣四省毗连的开化、淳安一带。卢永祥收编了这支队伍，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实力，但却由此引起直系控制的苏、皖、赣、闽四省的严重不安。按照吴佩孚是年5月5日致曹锟“歌电”的主张，他们便议定了四省图浙的计划。6月26日，浙江省议会议长提请卢永祥对收编一事应慎重处置。国会议员何雯也出面向卢调停。河南省长李济臣更受吴佩孚之托，向双方进行调解。但均归无效。湖北督军萧耀南曾分电齐燮元、卢永祥，吁请一方解散臧、杨所部，另一方切实维持江浙和平。而齐燮元则斥责卢永祥招降纳叛，态度强硬，欲借苏、皖、赣、闽四省名义迫之解散，并声言不惜以武力攻浙使之就范。吴佩孚于各方调解无效后，即于7月28日致电北京政府，主张迫卢永祥解散臧、杨所部之同时，电令苏、皖、赣、闽四省共筹对付局势之策。曹锟对此表示赞同。8月，四省联合迫卢解散，遭到拒绝，战争已势在必发。卢通电为收纳臧、杨作辩解，谓“当其（指臧、杨）转战而来之时，浙并未声息相通。比其来浙，不能不设法处理。……恰值彼军愿受约束，姑予收容，减师为旅，以缩小其势力，划地而处，使恪守其范围，浙民既可相安，邻封亦可不扰。”④人称卢收纳臧、杨而引起之争为江浙战争的“导火线”，不无道理。果然，在9月1日战争爆发前夕，孙传芳通电全国攻击臧、杨，以示决绝：“不谓臧、杨抵浙后，长驱入境，怡然如归，地方有交责之声，而主人无逐客之令。……兹特躬率三军为民除暴，助我则友，逆我则仇。”⑤

二

战争既难于避免，双方遂加紧备战。卢永祥通过何丰林，要求上海制造局于二十日以内，制造炮弹两万发，以应急需。同时向法国订购新式飞机十二架，战车十辆。并通令各属，“无分主客各军，一律补足，以示不分畛域”⑥。齐燮元也不顾吴佩孚等之劝阻，决心不惜与卢永祥一战。据称，早在1924年1月初，所有“（江苏）督署重要物件，数日来均已搬运一空”。⑦

接着，双方在战前均作了一定的军事布置。齐方联合了江苏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等省与直系有关军队，协同攻浙，共分四路进军：第一路攻上海，由中央第十九师师长宫邦铎、江苏第三师师长马玉仁等任之；第二路守宜兴，由江苏第五混成旅旅长陈调元等任之；第三路攻广德，由安徽第三旅旅长王普等任之；第四路攻仙霞岭，由闽军及赣军各一部任之。前三路由齐燮元任总司令，后一路由孙传芳任总司令。驻厦门海军也由杨树庄率领，驶向浙海及

淞、沪助战。齐方兵力总计达八万余人。卢方则联合浙江、上海及由闽入浙的军队，组成浙沪联军，并分南北两路应敌。总方针是：北攻齐燮元，南防孙传芳。其中浙省共有四个师，即第四、第十师，浙江第一、第二师。第四、第十两师“兵额、粮秣、军械，无不充足”，而浙江第一、第二两师兵额仅“足七成”，且“军械芜杂，咸不堪用”^⑧，官兵又有厌战心理。北路由卢永祥任总司令，下辖三个军。淞沪方面，由中央第六混成旅旅长何丰林、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臧致平、中央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杨化昭任指挥；长兴、合溪一带，由中央陆军第四师师长陈乐山任指挥；泗安一线，由松江镇守使王宾任指挥。卢本人则率补充团、卫队等“居吴兴为接应”^⑨。南路由浙江第二师师长张载阳任总司令，浙江第一师师长潘国纲任副司令，防守省城杭州。另以浙江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郝国玺为衢防司令，以防孙传芳自闽攻浙。卢方兵力总计达九万余人（其中浙军七万四千人，沪军一万七千人），稍多于齐方。

8月15日，齐燮元在南京召开有全省师旅长、镇守使参加的军事会议，即下动员令，集中军队四万余人于沪宁路沿线及太湖附近。卢永祥也将第四、第十两师集中于沪杭间，“暗中布防”。吴佩孚以调解无望，电令齐燮元：“计划已定，仰即进攻”，并电令江西督军蔡成勋出兵一师（三个旅），归孙传芳节制指挥。孙即于25日编组闽浙联军，下辖六个支队，分别以中央第十混成旅旅长孟昭月、中央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张俊峰、中央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卢香亭、中央第二师第四旅旅长谢鸿勋、福建第一混成旅旅长彭德铨、中央第十一混成旅旅长王麟为司令，拟分兵三路，大举向浙边进攻。旋令左翼第三支队司令卢香亭为前敌指挥。孙传芳行前对送行者发出豪语，中有“明年此日请诸君观潮钱塘”之约。26日，齐燮元令所部向宜兴、昆山集中，并亲自坐镇苏州指挥。越二日，齐又调派陈调元，专任对浙军事。他还屡向曹锟、吴佩孚催派外省援苏军队。吴决定派豫军郭振才一团、鲁军张烈一团及鄂军刘佐龙一团，归齐调用，但要求只能暗中调拨，以免“遗东北藉口”。曹则提出饬拨第二十三师或第二十四师即日南下赴苏，声称：“目下形势急迫，军情万变，……望速办理，勿延为要”。^⑩

帝国主义列强密切注视中国事态的发展。鉴于战争迟早总要爆发，早在1923年8月中，北京公使团即向北京政府表示，拟派联合舰队前来苏、浙“保护”外侨。及至1924年8月底战争爆发前夕，英、美、法、日四国驻华公使又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，提请注意去年8月间关于警告江浙战争的照会，切实“保护”外侨。30日，英国公使复单独为沪宁路交通问题照会外交部，虚声恫吓，声称：“应向贵总长提醒，此次战争，关于沪宁铁路及在上海一带本国人民之利益，如受若何损失，其责任即由中国政府负之。”^⑪9月4日战争一经爆发，北京政府立即答复英、美、法、日、意等国公使，声明在沪外侨之安全，将尽力予以注意。

三

齐军于9月2日强占安亭车站，并续向浙方防地黄渡迫进，江浙战争正式爆发。同时，北方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也正在积极酝酿之中。3日晨，江浙两军正式接触，在沪宁路沿线，及江浙、浙闽、浙赣接壤的一些地区开始交战。齐燮元亲赴昆山督战，白宝山等也赴宜兴指挥。同日，卢永祥通电就任浙沪联军总司令，声讨曹锟的“乱国”罪状，仍分三路对敌，以何丰林、臧致平为第一路正副司令，担任沪宁线防务；陈乐山、杨化昭为第二路正副司令，负责吴兴、长兴、宜兴苏浙皖赣防线；张载阳、潘国纲为第三路正副司令，负责对闽赣防务。此即有名的所谓“江电”。并分电广州孙中山及奉天张作霖，请其分道出师，兼筹并进，以伸张正义。根据过去三方共同反直默契，孙中山于4日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，决定派

湘、赣、豫军参加北伐，迁大本营于韶关，以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，并发表讨伐曹锟、吴佩孚告军民书及告广东民众书，阐述广东与浙沪的利害关系：“此战事且将由东南渐及于东北。……以全国言，浙江、上海，实为广东之藩篱。假如曹、吴得逞志于浙江、上海，则广东将有噬脐之祸。故救浙江、上海，亦即以存粤。”明确表示：“当与诸军会师长江，饮马黄河，以定中原。”^⑭张作霖也于同日通电全国，支持卢永祥反对曹、吴，表示将率三军，“扫除民贼，去全国和平之障碍”。

同（4）日，齐燮元也发出声讨卢永祥通电，列举其所谓“引背叛为声援”，自称“军务督办之名，……擅举僚属”，“主张省宪，献媚浙人”，及私自标榜，挟段祺瑞“以自重”各罪状^⑮。7日，齐又与吴佩孚就卢永祥江电发电声讨，并要求政府“明令讨伐”、“歼此大慝”^⑯。曹锟即于同日以所谓破坏治安，违背和平宗旨的罪名，下令褫夺卢永祥、何丰林本兼各职，并责成齐燮元率领所部，“相机剿办”。10日，齐燮元还根据上述曹锟命令，发出将认真“保护”中外商民的通电。13日，孙传芳也通电全国，指责卢永祥江电“侮辱元首，背叛国家”，表示将“督率联军迅扫逆氛”，并请各省“一致声讨”^⑰。自是月4日起至24日止，直系和附直各省军政长官或将领，闻风而动，如陆军检阅使冯玉祥、江西督军蔡成勋于6日，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、河南督军张福来、湖北督军萧耀南、海军总司令杜锡珪于8日，安徽督军马联甲、甘肃督军陆洪涛于9日，直隶督军王永斌于11日，山东督军郑士琦于12日，川滇边防督办刘湘于14日，新疆督军杨增新于24日，先后发表通电，声讨卢永祥，表示要“枕戈待命”，以“速平祸乱”。

站在浙卢方面反对苏齐的社会团体及孙中山等，也纷纷发出通电，声讨直系挑起这次战争，9月7日，全国各界联合会通电指责齐燮元“无故兴兵，……甘为戎首”，并请孙中山等“克日兴师，一致声讨”^⑱。18日，东三省议会通电声讨曹锟“卖国自肥”罪行。21日，直川粤湘滇旅沪讨贼同志会也通电声讨直系，指出此战“既非卢齐之争，亦非江浙之战，乃国民之讨叛窃，正义之敌凶残，公理之战强权，主义之驱盗贼”^⑲。另孙中山于是月10日及19日，又两次致电卢永祥，再三表示坚决支持，并告之已移驻韶关，出师入赣，誓与浙、奉各军，“一致讨贼”。

战争初起时，卢军进展较为顺利，在嘉定、黄渡等地击退了齐军的进攻。直系为扭转局面，一面不断调兵遣将，“积极援苏”。吴佩孚8日声称，他已电鄂、鲁两省各增派一旅，豫省增派一团。如山东郑士琦奉令后，即电飭旅长潘鸿勋，“迅速集合全部，克日开拔赴苏”^⑳。一面制造散布各种似是而非的谣言，藉以瓦解对方斗志。如通过报纸，宣称陈乐山已变节，接受曹锟所委的松沪护军使一职。又如让江苏督军署参谋处发出通报称，杨化昭在前线受重伤，已抬回上海医治。再如声言臧致平作战时受伤甚重，已病死于医院。冯玉祥批评此种做法时说道：“苏军的短处为乱放与乱报，战术上最忌乱报敌情。”^㉑伎俩一旦被揭穿，效果适得其反。

就在江浙战争开始后半个月，即9月17日，北方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。曹锟于是日下午下令反击张作霖，责成前线各将领督率所部，“相机剿办，克日肃清”。直系处于南北两方作战局面。18日，曹锟特派齐燮元为讨逆北路总司令，马联甲为副司令，孙传芳为讨逆南路总司令，蔡成勋、周荫人为副司令，令向卢军“两路进兵，前后夹击”。皖、闽、赣先后向浙进攻，江浙战争一变而为真正五省战争。其中以孙军的攻势，尤令人瞩目。孙传芳于当日通电就职，并宣布“由衢州即日督师前进”^㉒。同时电请北京政府以“背叛中央”之罪将潘国纲

撤职惩办。此前孙曾奉吴佩孚之命派队由闽攻浙。孙遂以一路从仙霞岭入浙，一路绕道玉山袭江山。16日，孙部孟昭月猛攻浙闽交界仙霞岭，旋又进占江山，卢永祥的炮兵团长张国威高悬白旗，向其投诚。自此趁浙江空虚，长驱直入。17日续占常山，18日又克衢县、开化。孙传芳声言拟于21日率部经严州，“直趋杭州”^②。在孙军的凌厉攻势下，卢军难于招架，乃向遂安等地退却，兰溪又告失守。22日，湖州复为孙军占领，卢军纷向嘉兴一带“分窜”。以上是浙西战场的情况。

与此同时，卢军拟绕道太湖以西占领宜兴，进取常州，以侧击齐军后背的计划，又告失败。12日，卢永祥怀疑自己内部不稳，有人与孙传芳妥协，浙江难于立足，乃决定将政权还诸浙人（卢系山东人），军政交与浙江军官周凤岐，以代第二师师长，民政交与浙江全省警务处长夏超，以代浙江省长，并委周承蕪代理浙江督办，然后偕同省长张载阳等离杭去沪，发表“移沪督师”通电，将浙沪联军总司令部移驻龙华。据称卢离杭时“情甚惶恐”，当在情理之中。是时，夏超以浙中空虚，暗中与孙传芳勾通，迎之入浙，杭州遂入孙军之手。同时，卢永祥以情势恶化，令陈乐山放弃宜兴，退驻嘉兴，驻广德的部队也退守吴兴，收缩战线，向上海靠拢。交战地境大为缩小，江浙之战又一变而为沪宁之战。

此时战争虽尚未结束，但胜败之局已定，北京政府遂于人事上作了一系列调整和安排，以加强对沪浙的控制。9月20日，曹锟下令裁撤闽粤边防督办的同时，特任孙传芳督理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兼闽浙巡阅使（孙24日抵杭后宣布就职）。同时任命朱广声暂代第十师师长（原师长为卢永祥），夏兆麟暂代第四师师长（原师长为陈乐山），并派李景曦为淞沪海军司令。不久又免去附卢之海军将领林建章、曾以鼎、朱天森等人职。21日，夏超、周凤岐致电齐燮元，要求双方停战，军队各自退回原防。齐随即复电表示同意，并电请“中央”，以夏超长浙，周凤岐接长浙江第二师。曹锟准其所请，于次日特任夏超为浙江省长（夏29日宣布就职）。

20日前后，卢军一部在淞沪，一部在长兴。但防守宜兴的卢军，受到“重创”后，难于在嘉（兴）、湖（州）立足，遂“向淞沪转进，战斗重心，更全偏于沪宁路上”^③。尽管卢军如今“物质精神，两经挫折”，但齐燮元尚顾忌卢军“遣散者转成乌合，鼠窜者变为兽斗”，乃调陈调元、杨春普部赴昆山，以厚兵力，又令白宝山率部经嘉、湖向淞沪“迅速跟进”，使对方无“喘息之时，更失增援之力”，并整顿主力，组织反攻，“务期一鼓作气，灭此朝食”^④。而卢永祥离杭赴沪后，本图在松江取守势，在上海谋发展。此时齐军已明显占优势。25日，曹锟于齐军攻占嘉兴后，令派齐燮元暂兼松沪护军使。卢永祥则令所部全数退入苏境，集中于上海附近，并改任王宾为第三军总司令，主持松江方面防务。又偕同何丰林、陈乐山、臧致平等亲临南翔等前沿阵地，谋求作战计划，拟分左右两翼分袭马陆。29日，齐、卢两军在黄渡、嘉兴间，展开激战。而10月1日的马陆之战，更“为开战以来最剧烈之战斗”，据云卢军死浙“约有三千人以上”^⑤。齐、孙两军前后夹攻，对上海形成包围形势。战事的不断失利，引起了卢军内部的争吵和不和。马陆战后，卢在龙华召集高级将领会议，商讨对策。会上，何丰林以战局不利，主张“静待时宜”，不可急于再战，而臧致平对此甚表不满，竟“破口谩骂，欲饱以老拳”，气氛紧张，后经卢从中排解，始“无结果而散”^⑥。

10月4日，曹锟以“全浙渐已底定”，齐卢之战已近尾声，下令嘉奖有功文武官员，并责成江浙军民两长，妥为“一切善后事宜”。是时黄浦江以南，已无卢军，孙传芳前赴曹家渡，“督师进攻松江”。齐燮元随即于5日下最后总攻击令。至6日，孙部第四旅已全部渡过黄浦江，“直迫松江城矣”^⑦。8日，卢方第三军总司令王宾逃往上海，所部也纷纷溃退，松江遂

为孙军占领。卢永祥尚不甘心失败，于9日以何丰林为松江司令，郑俊彦(第十九师旅长)为前敌总指挥，责成其收复松江。但为时已晚，无济于事。10日，齐军经猛烈进攻，又占青浦城，卢军“向城北及穿城溃退”^②。

卢永祥以前线战事迭遭惨败，松江、嘉定、青浦相继失守，遂于12日夜在龙华司令部召集陈乐山、臧致平、杨化昭、朱广声等密议最后应付办法。会上意见不一，引起争论。陈乐山认为，现今弹饷两缺，官兵又已苦战累日，虽欲再战，势有不能，不如急流勇退，以全大局。臧致平、杨化昭起而斥其非，声称官兵尚有三万，一旦放弃，殊属可惜，主张再战。结果因陈乐山第四师、朱广声第十师官兵均不愿再战，卢永祥遂通电宣布“洁身下野，……解除兵柄”，同时下令所部各将领各自收束军队，并以原任上海防守司令刘永胜暂代松沪护军使及第六混成旅旅长，负责维持地方秩序。此时，何丰林尚在莘庄督战，闻讯急返龙华，与卢面商机宜，终以大势已去，回天无力，经由上海商会筹款二百万作为川资，与卢等于次日凌晨，乘日本邮船出走日本。

13日，孙传芳据上海宪兵司令马葆珩(原为卢永祥部下)报告，一面指定地点，收容溃兵，一面令所部于距沪地十里处驻扎待命，本人“即日自带卫队进驻龙华，维持地方秩序”。^③此时，由南翔退至真如的卢军仍在臧致平、杨化昭手中，而黄渡、嘉定、浏河等地卢军均“表示投诚”，齐燮元遂令前线齐军“办理缴械给资遣散事宜”^④。鄂军援苏总指挥张允明也率所部于13日进占石岗门、马陆镇之线，次日进入上海，并报告北京国务院称：“所有秩序及上海治安，山职暂行维持”^⑤。

四

卢永祥、何丰林逃往日本后，浙沪联军残部推皖系干将徐树铮为总司令，继续抵抗齐军。因臧致平、杨化昭仍率部于真如一带作战，不肯放下武器，曹锟极为恼怒，即令齐燮元“设法严缉，勿任漏网”^⑥。孙传芳于进驻龙华附近华泾镇后，电请齐燮元即日来沪主持一切，并暂派白宝山为上海防守司令，负责办理善后一切事宜。他又表示一俟齐至沪后，本人“立即班师回杭”^⑦，以示无他。帝国主义列强一直插手这次战争。15日，徐树铮莫名其妙地为上海工部局所软禁，旋被送往英国。孙中山对此曾向广州领事团提出抗议。徐去，群龙无首，江浙联军残部彻底瓦解。关于卢军的改编及遣散事宜，经商定，战败一方由朱广声出面接洽，第四、第十两师及臧、杨所部，由齐燮元编为苏军，暂驻于吴淞附近。若不愿接受改编者，每兵给饷二十元，军官按级加给，然后遣散。

同(15)日，曹锟下令，以战区受灾严重，特派李厚基、王瑚等克日前往“宣慰”，会同各该省军民长官，办理一切善后事宜，并着由财政部拨银十万元，分别“散放赈抚”。越两日，曹又正式下令通缉卢永祥、何丰林、陈乐山、臧致平、杨化昭等人。至是，历时四十余日的江浙战争，遂以卢败齐胜而告结束。

五

江浙战争是1920年直皖战争、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发生的直皖战争的继续。这次战争持续了四十余日，终以卢败齐胜亦即皖败直胜而告结束。卢永祥、何丰林的皖系势力退出了上海、浙江地区，转而成为直系齐燮元、孙传芳的势力范围。战争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，造成了惨重的损失。

战争初起，卢方稍占优势。但这种优势，很快地就被打破。卢方的败北是必然的。其高级军官的腐败无能及不和，固为原因之一。而更为重要的是齐方占有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齐方有以曹锟、吴佩孚为首的北京政府作为后盾，而且联合了福建、江西、安徽等省的力量，其后，山东、湖北等省又相继出兵支援，从四面八方卢方取包围态势。而卢方局促于浙、沪两地，后又怀疑内部不稳通敌，过早放弃浙江，困守淞沪弹丸之地而难于施展。“三角同盟”的张作霖、孙中山两方，远在东北和西南，仅以声援而未能以实力相助，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。尤以奉张，战事已起而迟迟未动。及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，自顾不暇，更显得鞭长莫及不能为助。

江浙战争又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奏。战争开始十余日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。正当直奉两军在前线相持不下之际，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，囚禁曹锟，直系政府迅速垮台。曹锟下台后，卢永祥由日本回国，并与张作霖等共拥段祺瑞为“临时总执政”，以收拾局面。段之复出，予卢永祥以东山再起的良机。卢先被任为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，旋又改任苏皖宣抚使，奉令南下“宣抚”。根据段祺瑞的要求，张作霖派奉军张宗昌等率部随卢永祥南下，攻打盘踞江苏的宿敌齐燮元。1925年年初，卢永祥在南京组成宣抚军，以张宗昌、臧致平、陈调元为一、二、三路总指挥，东进上海平乱。事定后，卢永祥又经段任为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。齐燮元则以事无可为，逃往日本。卢终于报了上年惨败之仇。奉系势力自此由津浦线一直伸展到江苏和上海。

注：①③⑦⑫⑯⑰ 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档案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，下同）。

②⑭ 北洋政府热察绥巡阅使署档案。

④ 黄琨 1924年8月24日致王怀庆函；北洋政府热察绥巡阅使署档案。

⑤⑪⑮⑳㉑㉒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。

⑥ 柳世裕 1924年1月×日致陆锦函；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。

⑧ 赵玉珂 1924年9月4日致大总统呈；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。

⑨⑩⑬⑱ 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。

⑰ 〈冯玉祥日记〉1924年9月8日。

㉔ 齐燮元 1924年9月21日致大总统电；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。

㉕ 齐燮元 1924年9月23日致大总统电；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。

㉖㉗ 江苏督军署 1924年10月3日战报；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。

㉘ 孙传芳 1924年10月6日致大总统等电；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。

㉙ 齐燮元 1924年10月10日致大总统等电；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。

㉚㉛ 孙传芳 1924年10月13日致国务院等电；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。

㉜ 大总统府军事处 1924年10月14日致齐燮元等电；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。

㉝ 孙传芳 1924年10月16日通电；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。

（责任编辑 丁进军）